

中国少数民族传播研究系列
总主编 刘海贵

白山黑水 满族传播研究

● 汤景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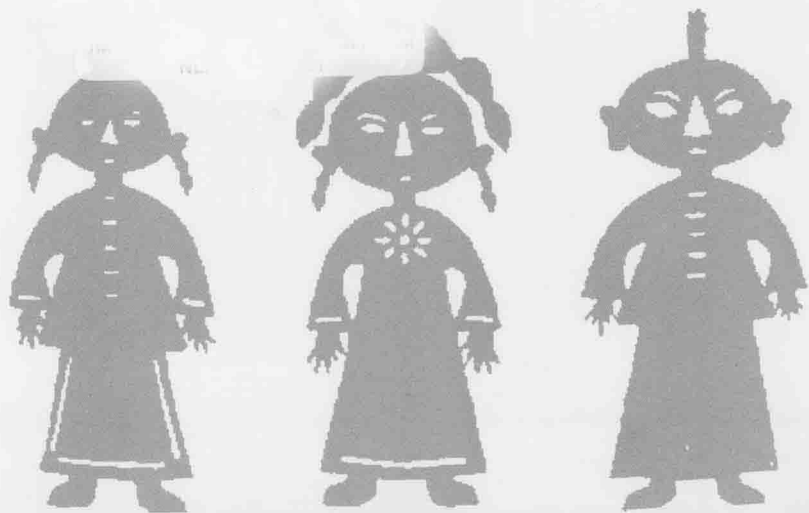
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成果丛书

中国少数民族传播研究系列

总主编 刘海贵

白山黑水 满族传播研究

● 汤景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山黑水:满族传播研究/汤景泰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3
(中国少数民族传播研究系列)
ISBN 978-7-309-10180-5

I. 白… II. 汤… III. 满族-传播学-研究-中国 IV. ①K282.1②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2220 号

白山黑水:满族传播研究

汤景泰 著

责任编辑/张 晗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4 字数 202 千

2014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180-5/G · 1253

定价: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六年前,新华社有则报道对我触动甚大,法国巴黎一家私立民俗博物馆已收藏 180 多套苗族服饰,该馆馆长对到访的我国有关民族文化研究的专家说:“一百年后,中国人要研究苗族的服饰文化,或许还要到我的博物馆来研究。”

是危言耸听还是忠告?我国从事民族文化与传播研究的专家一致认为这是忠告,并纷纷呼吁:要对我国民族文化资源严重流失和民族传播方式急速消亡现象引起高度重视,否则,若干年后,我国少数民族的存在将可能只是理论上的或是记忆中的。

三年前,我申请获批的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创新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传播历史与趋向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带有抢救性质的研究项目。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璀璨的文化和独特的民俗,并通过本民族特有的传播方式和活动,代代相传,维系着本民族的生存、发展与壮大以及与外界的适应。

所谓民族,是指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着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在共同民俗和文化上表现共同心理素质的相对稳定的共同体。一个民族要生存和发展,一定离不开传播,人类社会发展史充分证明,与民族发展的过程相适应,其传播也经历了一个相应的发展过程:传播媒介由低级向高级,传播方式由简单向多样,传播范围由狭小向宽广。

历史证明,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主要在于这个民族独特的民俗。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是一种来自于人民、传承于人民、规范人民又深藏于人民的行为、语言和心理

的基本力量,它不仅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也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对族群内部而言,各种民俗符号代代相传,凝聚成深入骨髓的“集体记忆”,延续着本民族的民族特性;对外而言,民俗符号通常构成反映一个民族历史的“生活相”,是外界认识民族的重要符号。民俗通常也可称作民族的“名片”,如同一提到泼水节,人们便自然想到傣族;提到哭嫁,便自然想到土家族。

民俗形成的过程,本质上应是民俗的传播过程。民俗通过内部的历时性传播,即代际传承,以及对外的共时性传播,促使其被认同和接受,最终成为各民族成员共同的约定俗成、具有特定内涵的群体规范以及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年来,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到有关民族和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我们认为,目前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现状有令人欣慰的一面,但更有令人隐忧的一面。

令人欣慰的一面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眼下表现为“多元共存”的局面。以媒介变迁的角度看,人类的传播历程迄今一般分为口头、书写、印刷、电子和网络五个阶段,且各阶段之间在较长时间里呈前后相继、交叉重叠的形态。在最近的三四十年间,由于现代传播技术的进步和国家政策的扶持,我国众多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方式呈现了多元状态,即本民族的文化传播方式在延续、发展,现代文化传播方式也在通过各种渠道被“植入”。例如,人口至今只有三十余万的羌族,原有的文字在西夏亡国后便失传,截至1992年,该族信息传播方式还为口头传播,包括羌族史诗、民歌等文化瑰宝,都是通过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口耳相传”。改革开放年代,政府主导羌族文字改革,这种用罗马字标注的“人造”文字影响范围和应用程度虽然十分有限,整理和改革的程度也极其艰难,但必须持之以恒地做好。这是因为,在科技进步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如同许多少数民族一样,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现代传播手段在羌族地区日益普及,这是好事,说明历史在进步,但少数民族历史传承下来的文化传播瑰宝,受到影响和冲击也是不争的事实。如何利用现代传播手段,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瑰宝得以更好地整理和传承,是历史给予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机遇和挑战。

令人隐忧的一面是,在民族文化传播生存和发展的背后,尚存在诸多深层次

的问题,如政府对民族文化传播的保护、整理和传承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民俗文化的传承机制和专门人才的培养机制尚未有效建立,等等。随着老人的相继离世,许多少数民族的民俗和文化也相继失传。现代的传播手段和舒适的生活,使得较多少数民族的年轻人习惯过一种单一、安逸的生活,他们并不把民族的风俗文化建设和传承当一回事,久而久之,以致本民族的文字不懂、本民族的语言不会,汉化倾向严重,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传承与发展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新旧共存”、“和谐共生”,是当下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迫不及待追求的生动愿景。毋庸置疑,经济、科技发展和市场力量等因素对民族文化传播的影响与冲击与日俱增,对民族文化传播资源的占有也必然影响到相关少数民族的文化消费模式和传播方式,甚至日益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活动与方式的新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传播的发展规律来看,新的传播方式部分改变甚至取代旧的传播方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绝不会完全取代。

我们坚信,只要各族人民齐心协力,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最终实现的一定是“共同演进与共同生存”(罗杰·菲德勒语)的繁荣景观。

刘海贵

2013年5月于复旦

目 录

总序

绪论

一、满族简介

二、研究综述

三、研究重点与方法

第一章 传播与满族共同体的形成

第一节 后金的决策监控机制

第二节 传播媒介的演进

第三节 后金的宣传策略与情报战

第二章 传播与满族统治地位的确立

第一节 帝国信息传播系统的构建

第二节 清朝前中期的新闻活动及其管理

第三节 清朝前中期的出版活动及其管理

第四节 清朝前中期的满语满文

第三章 传播与满族统治地位的丧失

第一节 帝国现代信息传播系统的构建



第二节 “革命反满”舆论与新闻出版控制·····	145
第三节 清末的满语文及满族新闻事业的兴起·····	154
第四章 东北满族地区现代传播业的发展 ·····	160
第一节 东北满族地区通信的现代化·····	160
第二节 东北满族地区大众传媒业的发展·····	168
第五章 传播与满族现代化 ·····	181
第一节 东北满族地区媒介接触与认知状况调查·····	181
第二节 大众传媒与满族地区的现代化·····	194
参考文献 ·····	209
后记 ·····	214

绪 论

一、满族简介

满族原称满洲，是 17 世纪以明代女真人核心，融合汉、蒙古、朝鲜、达斡尔、索伦、锡伯等民族并编入八旗制度而形成的民族共同体。从源流来看，满族发展的历史相当久远。一般认为，早在周武王时代，满族的先世肃慎就已经生活在东北地区，并与中原地区有了交往。其后，随着东北地区不同部族的先后兴起，满族先世又被称为“挹娄”、“勿吉”、“靺鞨”等。到了宋、元、明时期，名称开始固定化，汉文献中一般称其为“女直(真)”。从发展形态来看，满族从其形成到现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首先是满族共同体的形成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女真部落通过与明朝、蒙古的接触交流，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形态逐渐演进，并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逐渐由分裂走向统一，建立了自己的民族政权，最终在皇太极时期结成了新的民族共同体。

明朝初年，散居在松花江、黑龙江地区的女真人开始大规模南迁至吉林、辽东东部和北部一带。当时，女真人分为三大部：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与东海女真。建州女真主要活动于辽东浑河流域，海西女真活动于辉发河流域。这两部女真人已经开始涉足农业，并出现了阶级。东海女真也称野人女真，主要集中在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流域，仍以渔猎经济为主，滞留在原始社会末期。

随着经济的发展，女真各部之间的利益冲突愈来愈严重，结果出现了各部蜂起，互相战杀，称王争长的局面。经过兼并之后，到 16 世纪末，女真三大部中又形成了几个大的集团：满洲五部(包括苏克苏护河部、浑河部、完颜部、董鄂部和

哲陈部),长白山三部(包括讷殷部、珠舍理部和鸭绿江部),扈伦四部(包括叶赫部、哈达部、辉发部和乌拉部)以及东海女真(包括乌苏里江以东和黑龙江下游各部族)。

1583年(万历十一年),建州部的努尔哈赤以父祖所遗下的13副铠甲起兵,当年就征服了浑河部,然后又接连兼并了苏克苏护部、哲陈部、完颜部,只用5年时间就统一了建州五部。1587年(万历十五年),努尔哈赤在今辽宁新宾县苏子河畔修筑了佛阿拉城,成为一方霸主。1589年(万历十七年),努尔哈赤接受明朝封授的建州都督僉事,势力大增。接着,他又兼并了鸭绿江部,并于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击败了九部女真的联军,并乘机兼并了长白山北侧的朱舍里部和讷殷部,统一了建州部落。

明朝见努尔哈赤势力已经坐大,开始实行笼络政策,于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为取得明朝支持,努尔哈赤也多次到北京朝贡。在统一了建州女真诸部之后,努尔哈赤又开始把目标放在了海西女真与东海女真诸部。经过十余年的战争,他终于兼并了除海西叶赫部与个别东海女真偏远部落之外的女真各部。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天命元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老城)称汗,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改元天命。后金政权建立之后,努尔哈赤又树立了更高的目标。1618年(天命三年),他遍发“七大恨”檄文,兴兵反明,并很快占领了东州、抚顺、清河等明朝所属地区。1619年(天命四年),经过萨尔浒之战,他胜利击溃了明军的围剿,并征服了一直被明朝庇护的叶赫部,进一步巩固了后金政权。其后,努尔哈赤马不停蹄,将西起今鞍山、海城、盖平、熊岳、复县,东至宽甸、凤城的辽河以东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1625年(天命十年),努尔哈赤将都城迁至辽阳。1626年(天命十一年),在进攻宁远的时候,努尔哈赤遭受了一生中的唯一一次失败。他自己也因此身负重伤,于当年八月去世。努尔哈赤逝世之后,八子皇太极即位。皇太极继续对明朝用兵,夺取了除宁远之外的明朝全部关外领地,同时还统一了东海女真余部,实力进一步增强。1635年(天聪九年)农历十月十三日,皇太极废除诸申(女真)旧号,正式将族名定为“满洲”。一个以女真人为主体的,融合了部分汉人、朝鲜人、蒙古人以及呼尔哈、索伦等少数民族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诞生了。自此以后,“满

洲”作为正式的民族称谓被固定下来并统一使用。满族也将这一天视为自己民族的誕生日,并把每年的农历十月十三日这一天称为“颁金节”。

满族形成之后,随着对明朝战争的节节胜利,最终得以成功入主中原,建立了对全国的统治,进入了成为中国统治民族的阶段。

1636年(崇祯九年),在漠南蒙古诸部的一致拥戴之下,皇太极在盛京(沈阳)得到了蒙古可汗大统之位,随即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此后,皇太极继承乃父遗志,继续进攻明朝。1640年(崇德五年),明清松锦之战爆发,结果洪承畴在松山被俘,祖大寿在锦州投降。松锦之战失败之后,明军在关外的据点只剩下宁远一座孤城,这标志着明朝在辽东防御体系的崩溃。1643年(崇德八年),皇太极病故,九子福临即位。由于此时福临年仅6岁,于是以多尔袞、济尔哈朗为摄政王。在多尔袞的指挥下,清军继续向明朝发动进攻。1644年(顺治元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明思宗自缢身亡。为了扑灭农民起义,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向摄政王多尔袞“乞师”,同时发布檄文,号召支持清军进攻农民军。4月,清军在山海关打败农民军,并于5月2日进入北京。同年10月,清廷迁都北京,从此取代明朝成为统治全国的中央政府。此后,八旗军又马不停蹄继续镇压农民军和各地的反清武装。在清军的威逼利诱之下,北方的地主官僚纷纷迎降。1645年(顺治二年)初,清军分两路攻入陕西,一路由阿济格率领,吴三桂为前锋;一路由多铎率领,孔有德为前锋。经潼关一役,李自成放弃西安,东下湖广,结果在湖广通山县遭到当地地主武装袭击,死在当地的九宫山。同年春,由多铎率领的另一支清军,开始进攻南京的南明朝廷,于5月攻下了南京,并迅速占领了江南地区。1646年(顺治三年),清军采用分化瓦解的策略,先后消灭了鲁王和唐王朝廷,巩固了对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的控制。同年冬,清军在川北的凤凰山与张献忠展开大战,取得全胜。这样经过二十余年的战争,清廷陆续扫清了全国各地的反抗势力,先后消灭了大顺、大西和南明等政权,联合汉族、蒙古族等权贵阶层建立起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统治。

清朝建立后,中国社会经济获得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又通过多种方式维护了边疆稳定。康熙年间,清廷平定了三藩之乱,统一了台湾,两次进攻盘踞雅克萨的俄军,遏制了沙俄的侵华野心并最终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



东部边界线。另外,康熙朝还平定了回疆、准噶尔部等反动贵族的叛乱,巩固了全国的统一。此后经过雍正朝的发展,到了乾隆时期,清朝国力强大,社会稳定,内地和边疆的社会经济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史称“康乾盛世”。

承平日久之后,随着统治地位的日渐巩固和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作为统治者的满洲贵族集团整体上来看,斗志日渐消弭,生活却越来越奢靡。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另外,清代官员俸禄很低,皇帝一般情况下对于官员贪污和浮收税赋采取默许态度。所以到了乾隆后期,纲纪松弛,贪污腐败之风已经迅速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官员结党营私、相互倾轧、卖官鬻爵、贿赂成风;军队装备陈旧、营务废弛、纪律败坏、操练不勤;财政入不敷出、日益亏空。而嘉庆帝和道光帝也失去了早期君主锐意进取的精神,掌政风格日趋保守和僵化。社会整体溃烂之后,阶级矛盾激化,接连爆发了白莲教和天理教等农民起义。我国2000多年的皇权专制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一旦出现这种现象,便预示着另一个改朝换代阶段的开始。但清廷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仅要处理内忧,还要应对外患。1840年,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并逼迫清廷签订了《南京条约》。从此之后,不仅清廷而且还包括整个中华民族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列强蜂拥而至,割地、赔款以及其他类型的丧权辱国行为成为家常便饭。不仅如此,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也接连而起,对清廷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为挽救自身命运,清廷内部的有识之士展开了一系列自救运动,试图革新图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全国各地开始先后引入国外科学技术,发展了经济,改善了军队装备,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收复了新疆,创造了“同光中兴”的局面。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很快扑灭了清朝复苏的势头,此后“戊戌维新”的失败、八国联军的侵华以及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武装起义,使得清朝到了崩溃的边缘。为挽救清朝危局,慈禧太后开始推行“新政”,承诺并实行立宪。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成立了代议会,以确立君主立宪制政体。不过,在其后组成的“责任内阁”中,大多数成员仍为皇族身份,被称为“皇族内阁”,结果引发全国性的不满和抗议。这种维护满族统治地位的方式的最终结果是加速了满族统治地位的丧失。1911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7周之内,中国15个省陆续宣布脱离

清室独立。1912年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大臣的劝说和逼迫之下,隆裕太后接受清室优待条件,发布逊位诏书,宣布清宣统皇帝退位,从而结束了其统治全国268年的历史。

失去了统治民族的地位之后,满族和中华民族的其他成员一起,以整个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为发展目标,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辛亥革命之后,按照中华民国与清政府的协议,民国政府给清皇室提供了诸种优待条件,皇室的生活经费由民国政府承担,而且可以继续居住在皇宫之内。而在八旗制度废止之后,原来既不经商也不务农的八旗子弟开始自力更生。1932年,在部分前清贵族的支持下,日本关东军扶植前清逊帝爱新觉罗·溥仪,建立了伪满洲国,成为侵华日军的帮凶。但是满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一道,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涌现出众多抗日英雄,为抗战的成功立下了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满族成为56个民族中的一员。目前,满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北三省,以辽宁省最多。另外,在内蒙古、河北、山东、新疆等省、自治区以及北京、成都、兰州、福州、银川、西安等大中城市均有少数散居满族,形成大分散之中有小聚居的特点。现在主要的满族聚居区已建立岫岩、新宾、青龙、丰宁、宽城、清原、桓仁等满族自治县和若干满族乡。据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满族人口数为1 068万,在中国少数民族中仅次于壮族,居第二位。

二、研究综述

满族在我们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占据了独特的历史地位,产生了特殊的历史影响,在学术界也是一个研究热点。但是目前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与政治学等领域,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展开的满族研究仍不多见。比较集中介绍满族新闻传播的概况的是张佳生先生主编的《中国满族通论》(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有专章介绍满族的通信和新闻出版,对满族通信事业和新闻出版事业的产生、发展及其类型和特点有详细介绍,并且重点介绍了电报、电话和邮政在东北满族地区的发展以及一些重要的满族典籍和出版物。

不过在有关古代和近代新闻传播史的著作中,许多内容涉及了满族的新闻

活动。如方汉奇先生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对清代邸报、官报的创办运营概况,清末宗室子弟的新闻活动以及清廷对民间报刊的管理压制,都进行了非常细致的研究。在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中,又对清代前中期清廷官方的新闻传播活动以及对新闻传播活动的限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梳理。白润生先生是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他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和《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等著作勾勒了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发展的全貌,论述了民族新闻业与中国近现代新闻业的关系,探索了民族新闻发展的规律,对满族新闻活动和涌现出的著名新闻人物也有较详细的介绍。史媛媛的《清代前中期新闻传播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则把清代前中期的新闻传播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作了两点创新:一是把清军入关之前的满族传播纳入研究范围,对后金的塘报、檄文及其与明朝的情报战情况进行了归纳;二是对清廷控制新闻舆论的方式进行了详细介绍。此外,其他一些学者编著的大量关于近代新闻传播的著作中也都有涉及满族新闻传播活动的内容。

满族出版方面的研究状况与新闻方面情形大致差不多,在一些关于古代和近代出版史的著作中,有不少涉及满族出版的内容。如朱赛虹、曹凤祥、刘兰肖合著的《中国出版通史·清代卷(上)》(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从编修机构、翻译机构、出版机构、出版内容、印刷技术、装帧艺术、发行渠道与方式等方面,详细介绍了清廷的出版活动。更值得注意的是,该书还专列一章,介绍清代前中期少数民族文字书籍的出版。在对满族出版的介绍中,该书从官刻、私刻和坊刻三大系统出发,详细介绍了各主要出版机构、出版特色及代表出版物,详尽展示了有清一代满族出版的演变史。汪家熔的《中国出版通史·清代卷(下)》(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在介绍晚清70年蓬勃发展的民间出版业的时候,也没有忘记给已经日薄西山的宫廷出版写上一笔。

在清代信息传播系统的研究方面,清朝的驿传系统、电报和邮政等方面都有不少学者关注,并取得了卓有建树的成果。如刘文鹏的《清代驿传及其疆域形成

关系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通过对清代驿传在地域范围上变化的考察,对其管理制度中的物质供给、信息传递等的分析,揭示了清代驿传具体的实际运行方式,论述了驿传在国家政治、军事、疆域形成等方面的作用。他在论文《清代驿传体系的近代转型》(《清史研究》,2003年第4期)中,又对晚清驿传的衰落与电报、邮政的兴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在专制体制与驿传衰落方面的分析,比较深入透彻。孙藜的《晚清电报及其传播观念(1860—1911)》(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则以晚清电报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晚清电报及其传播观念的历史演进,其特色在于深入描述了这一进程中政治与经济、国际与国内、沿海与内地等诸种社会力量的交锋,从而展示了中国在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初期,新传播技术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晚清邮政的现代化是邮政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许多文章研究了清廷撤驿置邮的过程、国家邮政局的创办及其发展。如易伟新的《晚清的邮权统一政策述论》(《重庆邮电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一文,以对清廷政策的分析为基础,揭示了清廷在建立国家邮政局之后与外国客邮从妥协到抗争的转变过程,及与民信局从共同发展到压制的过程。

大众传播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研究,近年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其中一个主要的切入视角是大众传播与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如郭建斌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一书,以为期半年的越冬田野调查为基础,通过民族志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散文式的笔调,探究了云南怒江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怒族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与现代传媒的关系。其中对怒族人电视机的来源、观看电视的地点、观众构成及感兴趣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充满了真实的细节魅力。吴定勇的《大众传播与南侗社会文化变迁》(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09年)也是以长期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梳理了侗族传统信息传播方式,对南侗大众传播概况以及南侗人际交往变迁和侗族传统文化传承展开了富有深度的思考,并且对大众传播与南侗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此外,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还有柯克·约翰逊的《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仇学英的《西部乡村的大众媒介传播和农民政治

参与——来自贵州、云南、广西的调查报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张宇丹的《传播与民族发展——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新华出版社,2000年),益西拉姆的《中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大众传播与民族文化》(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大众传媒在民族地区农村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学术论坛》,2007年第12期),李勤的《大众传播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当代传播》,2005年第5期),戴蔚的《网络传播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不利影响》(《青年记者》,2008年第6期)等。

上述多数研究主要的关注点虽然不在满族传播,但却为满族传播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史料基础,一些富有创见的研究视角和结论对本书的研究极富启发意义。

三、研究重点与方法

作为一种人与自我、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传递、接收和反馈活动,传播与一个民族的形成、发展和壮大息息相关。可以说,族群内生产生活的协调,族人间关系情感的沟通维系,民族记忆的积淀传承,皆须臾离不开传播。而对于满族来说,其形成和发展还有自己的特殊性。满族是在女真部落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政权,然后在这个政权的推动下,融合多种民族形成的新共同体,而且又是在这个政权的带动下,成为中国的统治民族长达260余年。因此,对于满族来说,如何建立自己的政权并维护和巩固作为统治民族的地位,是满族发展史中的第一个主题。在应对这样一个政治主题的过程中,更是丝毫离不开传播的支持。传播恰似政治的神经,政治则成为传播的控制器,两者密不可分。有鉴于此,本书第一个研究重点将从政治传播的角度,探析传播与满族共同体的形成以及满族统治地位确立与丧失之间的关系。

辛亥革命之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现代化成为包括满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发展主题。在满族现代化过程中,传播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以电信产业和传媒产业为主的传播业是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近年来我国信息产业以高于国民经济的速度发展,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不断攀升,对国民经济的直接贡献率不断提高。另外,现



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产品的广泛应用,将推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大幅降低物资消耗和交易成本,对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以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式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其次,大众传播学的研究表明,大众传播可以促进或协助社会发展,推动个人现代观念和意识的养成,能够引发或加速个人以及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目前,满族聚居区主要集中在我国东北地区,由于地理和交通等各方面的限制,许多地区在现代化的问题上面临着不少困境。因此,从传播的角度思考满族地区现代化问题,分析其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及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别,解析其传播困境,并提出解决建议是本书的第二个研究重点。

基于以上研究重点,本书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资料梳理、田野调查和统计分析。

文献资料梳理:在流传下来的满族神话、传说以及满族各类档案史料中,详尽考察满族民歌、史诗、神话、图腾、风俗、节庆活动以及建筑等方面所蕴含的传播含义及其富有民族特点的传播方式,分析传播与满族民族共同体形成以及确立、巩固和丧失统治民族地位之间的关系,探讨传播在满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已经起到和应该起到的作用。

田野调查:实地考察满族聚居区传播发展现状,了解当地所面临的传播困境,并通过问卷的形式调查当地居民的媒介接触和评价状况,考察传播在实现满族地区社会整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传统文化传承和人际交往变迁,尤其是在促进人的现代化和满族传统文化传承方面起到的作用。

统计分析:根据问卷调查数据,统计满族聚居地居民的媒介终端拥有状况、接触状况及评价状况,并分析其与年龄、性别、职业、收入等因子的相关性,为科学考察满族聚居地的媒介接触关系奠定坚实基础。